

“新女性”的诞生与近代中国社会

——兼论与日本之比较

「新女性」の誕生と近代中国社会

——日本との比較研究を視野に入れて

The Rise of “The New Woman” and Modern China:
Wi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

何玮 著

“新女性”的诞生与近代中国社会

——兼论与日本之比较

「新女性」の誕生と近代中国社会

——日本との比較研究を視野に入れて

The Rise of “The New Woman” and Modern China:
Wi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

何玮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女性”的诞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兼论与日本之比较/何玮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15-6792-0

I. ①新… II. ①何… III. ①女性-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9918 号

出 版 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王鹭鹏
封面设计 李嘉彬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38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作为意象概念的“新女性”在近代中国的建构

晚清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显示了一种全方位的变革,这种变革从观念到政治制度,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和社会结构,从社会结构到文化传统,从文化传统到日常生活,波澜起伏。女性解放是这种变革的表象呈现,“新女性”则是女性解放的话语之一。但是,谁的“新女性”;从什么视角观照“新女性”概念的形成;作为意象的“新女性”概念与新女性形象的表征到底是何种关联?何玮的力作《“新女性”的诞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兼论与中日比较》恰是从这些以往不被人关注的视角对近代社会“新女性”概念的形成进行了独辟蹊径的探索。何玮本人是一位女性研究者,留学日本多年,学养深厚,潜心“社会性别”研究,从本书的框架可以窥见其丝丝入扣的梳理、细腻的分析 and 犀利的批判性论述。

中国社会的1910年代是新旧体制交替、思想与文化冲突尖锐的时代,1930年代后救国图存成为历史的主旋律,1920年代则显得相对平稳,本书正是以这个时期为时间轴展开分析,恰是这种社会状态,为中国近代“新女性”概念的提出、丰富和传播提供了社会土壤。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谈到,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她则是“他者”。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这就将“女性”视为一个建构的概念。既然是建构的,就涉及谁来建构,在怎样的语境(社会脉络)中建构,满足何种意象的建构?这也直

接催生“性别”的社会建构的视角。1975年,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提出“社会性别”的概念,此后,“社会性别”研究广泛兴起。勒纳在鲁宾的基础上补充说,“社会性别”一词使我们警觉到一种被给予的、与实际不同的、在生理性别之上有意识构建精神层面的意义^①。

本书的分析是从1920年代男性知识分子阶层对“新女性”的叙述和书写入手,解读介于历史真实、情感传递的媒介与载体之间的“新女性”。当“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将西方思想引入中国社会时,其对原有的“父权制”社会进行了猛烈批判,勾勒了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婚姻观念、生活方式和处事方式,对诸如“贤妻良母”“男女交际”“恋爱婚姻自由”“贞操问题”“废娼运动”“儿童公育”“男女共学”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这种言说的基础是反传统,“妇女解放”是通过反传统而实现的。当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杂志唱响“妇女解放”序曲后,众多男性知识分子与之呼应,加入其中,最终汇聚成一股时代潮流。

然而,问题恰在这儿,“新女性”所言说的是男性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女性解放,某种意义上满足了男性视野中女性解放的意象,定义和叙述“新女性”的是男性,“新女性”仍是一个波伏娃所称的“他者”形象。何玮本书中探讨的,是男性知识分子如何叙述作为“他者”的“新女性”的,他们在“女性解放”的进程中试图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是否能够建构精神层面的“新女性”意义。这是一项概念考古学的工作,透过这种探讨,她从“社会性别”视角勾勒近代中国“新女性”概念的建构过程,由此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女性发展与女性教育进程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形成,意义不凡。

是为序。

吴 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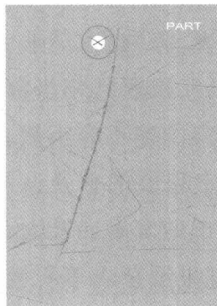
(序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

^① Gerda Lerner,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15.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新女性”话语研究与《妇女杂志》	(22)
第一节 《妇女杂志》诞生的历史背景	(23)
第二节 《妇女杂志》的编辑方针	(29)
第三节 《妇女杂志》的读者层	(50)
小 结	(51)
第二章 近代女子教育与女性价值观之嬗变与重构	(53)
第一节 西方传教士唱响的“启蒙”序曲	(54)
第二节 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主导的“启蒙”话语及实践	(56)
第三节 近代女子教育正统性及话语权的获得	(61)
第四节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与清政府对“女性”社会性别的书写	(64)
第五节 民国政府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定位	(68)
第六节 清末民初女子教育的发展壮大	(71)
小 结	(73)
第三章 男性知识分子与“新女性”话语建构	(75)
第一节 男性知识分子的配偶选择言论及其社会属性	(77)
第二节 女子教育——区分“新女性”与“旧妇女”的风向标	(84)
第三节 近代女子教育的文化内涵及“新女性”形象建构的历史实践意义	(88)
第四节 对现实生活中“新女性”的批判	(91)

小 结	(105)
第四章 围绕“新女性”的身体书写构图	(110)
第一节 近代体育观念在中国的确立及发展	(112)
第二节 近代卫生观念的输入与其对“身体”的书写	(116)
第三节 近代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的重构	(121)
第四节 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身体”的诉求	(137)
第五节 介于资本扩张欲望与男性知识分子诉求之间的女性“身体”	(148)
第五章 “新女性”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吴贻芳个案研究	(150)
第一节 吴贻芳的个人经历	(151)
第二节 金陵女子大学的创办与近代中国社会“新女性”的培养	(153)
第三节 国家民族主义抬头与“新女性”	(156)
第四节 “新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	(160)
第五节 “新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163)
小 结	(166)
第六章 近代女学在日本的本土化进程及其特点 ——以下田歌子的女子教育理念及实践为例	(168)
第一节 “贤妻良母”话语在日本社会的植入	(170)
第二节 贤妻良母女子教育家下田歌子的生平	(174)
第三节 下田歌子女子教育理念的形​​成	(177)
第四节 下田歌子的女子教育阶层论及其实践	(184)
小 结	(194)
结 语	(196)
参考文献	(205)
后记	(224)



导 论

一 研究课题与目的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以往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历史叙述的反思不断深入,近代报刊资料作为历史重构的重要线索和途径备受瞩目。与此同时,自美国学者琼·斯科特(Joan Scott)于20世纪80年代将“社会性别”作为具有批判性的分析概念导入历史学研究后,历史学的书写获得新的思维方式和探讨空间,社会性别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相关的研究成果随之大量涌现。然而,在社会性别史之前,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妇女史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尤其在东亚地区,对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女性观的梳理早已成为妇女史研究的共识。换言之,东亚地区聚焦“女性”的相关研究有其自身的传统和脉络。

立足于既有的研究成果,梳理近代中国社会围绕“女性”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解析“近代”对于“女性”的书写特点,以此为契机探寻思考中国“近代性”新的思维空间,是本书的主要议题。具体而言,揭示1920年代中国社会“新女性”被建构的历史进程,思考话语建构背后隐含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剖析其被时代裹挟着步入“近代”时的精神状态,可为我们探讨中国社会的“近代性”问题提供新的路径。要强调的是,本书所谓的“新女性”话语建构,指男性知识分子将受过近代学校教育的女性作为探讨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抒发情感等时的思想资源和载体活用的历史过程。

1920年代的男性知识分子阶层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之一。广义的“五四”新文

化运动(指1910年代后半期至1920年代中期,以下简称“‘五四’运动”)作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高潮及新时代的起点一直深受中外史学界重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精英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备受瞩目,相关的研究积累已相当深厚。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精英知识分子发出的呐喊之声的确不容小觑。然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随着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及一定程度的普及,一批青年男性知识分子已成长起来,恰逢近代传媒业在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和壮大,历史为他们创造了“发声”的机遇和舞台。青年男性知识分子通过报纸杂志等积极参与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其见地、观点、感悟等已然汇成一条思想之流,见证了中国迈向近代的思想之旅。尽管他们并非精英中的灵魂人物,也并未承担起时代旗手的领袖重任,其言论可能仅为只言片语,未形成逻辑严密、自成系统的思想体系,有时甚至显得杂乱无章、前后矛盾,对于这条思想之流的探寻也因此难逃平淡无奇、难于梳理之嫌,但是,当我们探究近代“启蒙”的思想之旅最终走向何处、以何种形式嵌入社会现实之际,这条思想之流就显得弥足珍贵。

捕捉女性进入历史的时间及语境,探究其历史呈现的形式及特点,是本书关注的另一焦点。一方面,从1990年前后开始,以近代中国女性为课题的女性史研究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地广泛展开,这些研究大都延续以往历史书写的惯性,将目光聚集在“五四”时期精英阶层的妇女解放言论上。另一方面,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是,近年来探讨“男女共学”“经济独立”“自由恋爱”“产儿制限”等“五四”时期具体的“妇女解放”议题的论文显著增加,有效地拓展了女性史书写的可能性。然而,这些论述大都基本停留在议题本身,对探讨这些话题的行为主体却往往“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有意识地将散落在报纸杂志等媒体中的男性知识分子阶层的声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关注,探讨其主体性特征的研究还相当匮乏。不仅如此,上述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还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将作为叙述主体的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的描述及建构直接等同于当时“女性”状况本身,一言以蔽之,就是将叙述主体的言论直接等同于被叙述主体的真实状况。

1920年代是本书探讨的时间范围。众所周知,清末民初,在一片学习西方的氛围中,中国社会步履蹒跚地迈向近代化的道路。思想文化层面上,伴随着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它们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发生激烈碰撞。置身于那个转型的年代,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阶层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教育状况、经济问题等投以极大关注,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体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而言,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围绕着共和制还是君主

立宪制的政治纷争与对立十分激烈,思想层面上宣扬“民主”与“科学”的近代西方思想与传统的儒学思想之间的交锋毫不逊色。步入1930年代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事件让日本的侵华战争不断升级,中国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相对而言,1910年代是一个新旧体制、思想文化冲突与交锋的时代,1930年代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与之相较,介于两战之间的1920年代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历史时期。

20世纪20年代,除了济南事件之外,中国与列强之间基本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是一个国际关系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同时,国民政府与列强缔结的新关税条约,意味着恢复主权这一努力基本取得成功。国内军阀间的混战虽连绵不绝,但北伐战争的胜利基本上扭转了这种局面,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下的中国向统一的国民国家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在内外局势相对平稳的情况下,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蔓延着对未来中国的憧憬,他们渴求一个实现了主权在民、充满民主气息的国家的到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向国民国家迈进的重要时期^①。不仅如此,近代报刊媒体的发展繁荣也为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知识分子撰文著述,宣泄着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焦虑,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中国走出“黑暗”,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同时,也渴望自身能够摆脱封建枷锁的羁绊,实现“个性”解放。这一时期是男性知识分子阶层围绕着中国近代化问题进行多方思考的重要时期。

综上所述,本书将聚焦1920年代男性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新女性”的叙述与书写,解析界于历史真实、情感传递的媒介与载体之间的“新女性”话语建构,揭示其作为一个符号、一种隐喻的时代功能,并由此切入洞察1920年代男性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世界。

二 文献综述

如前所述,东亚地区的女性史有其自身的脉络和传统,不仅如此,西方的女权运动、后结构主义、社会性别研究理论等为相关研究的推进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和切入方式。此外,各种近代报刊、个人传记等史料的挖掘整理,让分析文本更加多元立体,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也因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趋势,研究成果可谓百花齐放硕果累累。回顾近年来的研究文献,基本可从以下几条线索进行梳理,限于

^① 狭間直树ほか:《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国》,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第2~27页。

篇幅,在此仅对有代表性的著述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 基于线性历史观的女性史研究

1990年前后,大陆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迎来高峰期,以中华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①,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②及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③等为代表的妇女运动史书写集中涌现,这些著述为我们把握近代妇女运动提供了宝贵线索,其写作可谓在不毛之地之上的开拓之举。然而,上述研究大都致力于提供通史性的女性史叙述,具体而言,站在线性发展史观的立场上,将近代中国女性史大致按照民国初期的参政权运动(1912—1913年)、“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1924—1927年)、土地革命及抗日民主运动中的妇女运动(1927—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1937—1945年)的轴线构建,描绘出女性一步一步迈向“进步”的历史轨迹。

上述研究基本认为“妇女解放”自梁启超、康有为等清末维新派倡导的“废缠足、兴女学”起步,之后在各个时间点上不断向前迈进。具体而言,以清末维新派的主张为分水岭,之前的女性史墨守传统,导致所谓的“黑暗”,之后则在追求“自我”、“独立”的道路上不断迎来新天地。这些研究仍站在传统宏大叙事史观上,将女性史视为传统史学延长线上的产物,认为其是对旧有历史书写的补充和添加。这样的知识生产试图用同一模式概括所有女性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整齐划一的近代女性史。换言之,在将“女性”可视化过程中,将其视为了一个均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集合体。

其一,通过本书的探讨不难发现,“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所提及的“妇女解放”言说具有十分明确的指涉对象,他们根据女性的学历、阶级、年龄等社会属性的不同,赋予“妇女解放”不同的内涵。将多样性的问题用整齐划一的方式处理,这种历史叙述中的简单化处理不言而喻。

其二,通过《妇女杂志》中众多执笔者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可以看出,围绕着“妇女解放”,赞同与反对之声始终并存,男性知识分子在推进这一论调时不断要直面传统,与旧有的习惯迎面而战。然而既有研究展现给我们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图

① 中华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

②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

③ 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景,即当时的“妇女解放”言论受到空前追捧,社会影响力巨大,男性知识分子轻而易举获得了话语权。这样的历史叙述无限放大研究者自身的某种愿景与倾向,对历史进行了简单化、图式化处理。如此一来,“妇女解放”就显得方向性明确且条理清晰,这样的历史叙述中人为“加工”的痕迹十分明显。

其三,回顾“五四”时期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史积累,有待解决的课题愈发明晰。当男性知识分子试图将西方思想导入中国社会时,其对旧有的家父长制度进行猛烈批判,并力求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女性规范。他们的论述中明显存在一种书写策略,即将女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一种富于战略性的叙述。历史研究者如果将其有目的地处理过的时间节点直接用作历史分析的切入点,这种知识生产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将其视作男性知识分子声音的复制品更为贴切。不仅如此,这样的知识生产还导致了另一问题的滋生,即“妇女解放”愈发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存在,思维的惯性让其成为毋庸置疑的盲点。

(二)关注近代女性生活状况的研究

与着眼于描述女性进步史的论述相异,从实际生活状况出发探讨近代女性生存状况的研究也是近年来的一大亮点,吕美颐、郑永福《中国近代妇女生活》^①,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②,周叙琪《1910—1920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③,贺萧(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④,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⑤,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⑥,侯艳兴《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1927—1937)》^⑦,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⑧,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

① 吕美颐、郑永福:《近代中国妇女生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 周叙琪:《1910—1920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6年。

④ 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⑥ 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⑦ 侯艳兴:《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1927—1937)》,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⑧ 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与社会》^①，曾越《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②，李从娜《近代中国报刊与女性身体研究——以〈北洋画报〉为例》^③等，从各个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女性的实际生存状况。众多的学术积累丰富了研究视野，也迫使我們反思该如何使用史料，所谓的历史书写意义何在，贺萧的著述在这方面尤其富于启发性。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一书使用游记、指南书、小报、医生手记、慈善团体的报告等各类史料，对围绕娼妓的种种记述、描写及讨论进行了解构式分析，试图复原某种特定历史构图并探讨其形成原因，剖析隐含其中的时代情感。作者将娼妓视为一个隐喻，一个被赋予了多重意义的流动、变化的语汇，一面映照这一概念建构主体的镜子，由此我们可以把握建构主体的叙事策略，分类逻辑等等。建立在后结构主义及女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探讨，使我们深刻意识到文本的构图、其中的人物关系等是探究历史的重要渠道，对不同文本的解构及对比研究是复原历史十分有效的路径。

解构“娼妓”这一语汇时，围绕着她的人物关系、历史场景复杂多样、充满不确定性，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场所及时间会赋予其不同含义，正如作者所言，“每一种社会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④。但是，在具体探讨文本时，作者却未将这一观点贯穿其中，这是令人感到遗憾之处。换言之，贺萧绘制了一幅20世纪以“娼妓”为主题的话语建构的历史地形图，却未对话语建构主体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解析。

受欧美口述史影响，李小江试图另辟蹊径探索近代中国妇女史书写的可能性，从1992年起启动了一个名为“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的研究项目。参与者近千人次，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达到600余份，历经十年于2003年集结成包括《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等四卷本出版。“长期以来，

① 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

② 曾越：《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李从娜：《近代中国报刊与女性身体研究——以〈北洋画报〉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④ 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女性的话语权利和能力一向被忽视,女性的声音很少得到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关注,我们发掘和记录女性的历史经历,正是试图用女性的表述证明女人的存在,给从来是‘无性’或‘男性中心’的传统史学提供新的视角……这套丛书记录了女人的经历,却不尽是‘女性主义史学’,它无意发掘女人的特殊贡献或特别张扬女人的权利。在阅读中你会发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妇女的主体意识中,多的恰恰不是‘女性中心’,而是承载着过重的国家、民族、社会、家庭负荷,这与一般西方女权主义者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①用女性的视角切入记录其自身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感受,最终形成的却不仅是女人自身的历史,从中我们看到了一部连带着家庭、民族、国家、社会的近代中国社会史。

(三) 针对男性知识分子“妇女解放”论的研究

关注近代女性史,“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思想重镇,国内外的研究积累亦相当可观。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早在1973年就撰文进行过详细探讨^②,此后台湾地区逐渐迎来相关研究热潮。1979年,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③,至2009年,已陆续推出八集系列论文集。张玉法、李又宁合编的《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一辑和第二辑^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妇女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杂志,均刊载了大量相关论文。

中国大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两部探讨“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论的专著,分别是陈文联的《冲决男权传统的罗网——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研究》^⑤及韩贺南的《平等与差异的双重建构——五四妇女解放思潮研究》^⑥。论文方面,汪丹《五

① 记者:《让女性的“口述”重现历史——访“20世纪妇女口述史丛书”主编李小江》,《文汇报》2003年2月14日,第15页。

② 小野和子:《五·四運動時期の婦人解放思想——家族制度イデオロギーとの対決》,《思想》第590号(1973),第1175~1192页。

③ 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79年。

④ 张玉法、李又宁合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1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张玉法、李又宁合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2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⑤ 陈文联:《冲决男权传统的罗网——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研究》,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⑥ 韩贺南:《平等与差异的双重建构——五四妇女解放思潮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

四时期妇女解放观的几个层面》^①，郭金梅《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理论的探讨》^②，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③等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据孙耐雪的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以来的十五年中，关于“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研究的文章达300余篇^④。当然，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的学者对此话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探讨，仅对有代表性的国内外著述进行梳理和总结。

1. 关注具有代表性男性知识分子“妇女解放”论的相关研究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问题，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1973年就分析过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刊载在《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的文章，探讨当时的“男女交际”“恋爱、婚姻自由”“贞操问题”“废娼运动”“儿童公育”“男女共学”等问题^⑤。尽管小野的研究实际上仍站在旧有的思想史框架中对其进行有关女性话题的补充，但作为最早系统关注“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言论的论述，其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王政的著述《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⑥，访谈了学校经营者陆礼华、律师朱素萼、曾经担任过《女声》杂志主编的王伊蔚等五位亲历“五四”的女性，将其言论与男性思想家的“妇女解放”论进行比对，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了“五四”时期男性思想家的“妇女解放”论。通过建构一个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思想家们借此将自身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疏离感及不满之情发泄出来，不仅如此，他们也想借此树立自身在年轻人中间的领导者地位。尽管男性思想家们塑造了单一的女性形象，但五位受访者的人生经历展示了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现实世界，诠释了个体的能动性及其多样性。

① 汪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的几个层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45～50页。

② 郭金梅：《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理论的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101～104页。

③ 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学术研究》1999年第6期，第5～10页。

④ 孙耐雪：《近十五年来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研究述评》，《党史文苑》2011年6月下半月，第76～78页。

⑤ 小野和子：《五・四運動時期の婦人解放思想——家族制度イデオロギーとの対決》，《思想》第590号（1973），第1175～1192页。

⑥ Wan, Zheng (王政),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日本学者坂元弘子的系列研究^①亦值得关注。探讨清末西方优生学思想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聚焦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的优生学思想,认为他们的讨论及论争对优生学思想渗透进中国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优生学思想成为当时“妇女解放”的理论资源,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并活用。从探讨“妇女解放”言论本身到思考支撑该话题推进的理论资源,坂元的研究为我们思考“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提供了方便,将相关问题的探讨引向更深的层次。

此外,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②可谓代表性著述。该书将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丁玲等女作家的作品放在欧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框架下进行解析,试图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女作家的精神轨迹。尽管这是一部文学研究著述,但该书对男性思想家“妇女解放”论的洞察及定位十分精彩。“在这个弑父的时代,在父的礼法、父的家庭、父的语言都遭到攻击和弃绝的时代,妇女问题的提出如果不是势在必然,至少也是理所当然,她牵动着父系文化的每根神经。当然,妇女问题能够进入轰毁父系文化大厦的第一批引爆点,首先得归功于男性新文化先驱者们的疾声呐喊。很难想象,若是没有这样一批逆子们的呐喊,老旧中国女性的命运和少年中国新女性的出路问题,是否会提上文化议事日程;备受凌辱的旧女性与反叛勇敢的新女性,是否会成为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文化成员。”^③一方面肯定了男性知识分子提出“妇女问题”的开创性,但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这一行为与其自身的关联:“实际上,从女子解放、男女平权、家庭改组、女子人格、女权与法律、贞操问题、女子社交等一系列问题被提出和讨论时起,女性就掉入了一个心理的、更是话语的陷阱;这些问题既是,又不是带有特定性别针对性的问题。从字面看,它们包含的是妇女解放之意,具有鲜明的性别针对性,而从历史语境看,它们又与‘打倒孔家店’、‘科学与民主’、白话文、‘劳工神圣’、‘抵制日货’、恋爱自由共同源自一个‘反传统’的语义。此刻它具备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和历史的针对性。对男性而

① 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恋愛神聖と民族改良の“科学”——五四新文化ディスコースとしての優生思想》,《思想》第894号(1998),第4~34页;《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観・博覧会事件》,《思想》第849号(1995),第61~84页。

②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部分第8~9页。

言,这两种针对性是可以合而为一的,正是为了反封建的历史目的他才提出女性问题。”^①

男性知识分子之所以将“妇女问题”提上日程,首先是基于“反传统”,反对旧有权力秩序的目的。对于男性而言,二者具有同源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一话语隐含着对女性误导的可能。作者从女性主义批判的立场出发,对男性知识分子的“妇女解放”话语进行了批判。如何解读“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之前的研究早已贴上“进步”的标签,《浮出历史地表》的问世为我们思考该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开拓了新的路径和思考空间,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部著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聚焦更为宽泛的男性知识分子阶层的女性书写

与早期的研究相异,近年来关注更为广泛的男性知识分子阶层“妇女解放”言论的研究逐渐涌现,其中村田雄二郎编著的论文集《从〈妇女杂志〉看近代中国女性》^②、白露(Tani E. Barlow)的论文《探析妇女:妇女、国家、家庭》^③、《政治与“妇女”规范:重塑民族国家妇女》^④、陈延媛的论著《东亚的贤妻良母论——被创造的传统》^⑤、许慧琦的《“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0s)》^⑥、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⑦等具有代表性。

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编著的论文集《从〈妇女杂志〉看近代中国女性》,集结了包括日本、中国、美国、韩国等各地的学者,对《妇女杂志》的收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以《妇女杂志》为主要分析文本,对1920年代的废娼问题、自由离婚、节制生育等问题进行全面探讨。该论文集挖掘、关注那些以往为思想史研究忽

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绪论第43页。

② 村田雄二郎编著:《〈婦女雜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東京:研文出版,2005年。

③ Barlow, Tani E.,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Chinese Woman, Chinese State, Chinese Family)”, Zito, Angela & Barlow, Tani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253~289.

④ Barlow, Tani E., “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ü: (Un) making National Woman”, Gilmartin, Christina and Hershatter, Gail et al.,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39~359.

⑤ 陳延媛:《東アジアの良妻賢母論——創られた伝統》,東京:勁草書房,2006年。

⑥ 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0s)》,台北:鸿柏印刷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

⑦ 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